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9.03.012

“温州模式”发展历程回顾及价值思考*

杨效泉

(温州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模式”蓬勃发展,迅速成为我国发达的区域经济实践和先进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代名词。改革开放至今,在历经探索期、爆发期、瓶颈期和恢复期四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后,“温州模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正焕发着全新的生命力。“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我国民营经济的生动样本,是广大温州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对1978年至2018年期间“温州模式”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回顾,思考和总结“温州模式”的发展经验,对于推动温州经济社会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改革开放;温州模式;历程;价值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105(2019)01-0050-07

The Development Review and Value Thinking of Wenzhou Model

YANG Xiao-quan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enzhou Model developed vigorously and quickly and became the pronoun of China's developed regional economic practice and advanced priv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four different stag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namely, exploratory period, explosive period, bottleneck period and recovery period, "Wenzhou Model" is glowing with new vita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nzhou Model is a great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vivid sample of China's private economy, and a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working people in Wenzhou.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enzhou Model from 1978 to 2018 and reflect and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Wenzhou Model for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refo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enzhou's economy and society.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nzhou model; progress; value

温州市作为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和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成千上万的温州农民从农村走向市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形式来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开创众多的“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全国第一部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性规章、全国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党委等等。在改革开放道路上,温州广大的劳动人民凭借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温州精神”,创造了充满活力、享誉全

国的“温州模式”,走出了一条极具区域特色的改革发展之路。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的代名词,“温州模式”近年来遭到不少非议。诚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温州曾几度浮沉,但“温州模式”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依旧强大,在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温州模式”也将进入一个全新变革的新时期。

一、“温州模式”的历程回顾

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开创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先

收稿日期: 2019-08-13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基因视域下的温州模式研究”(19wsk036)

作者简介: 杨效泉(1989—),男,福建福清人,硕士,温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性人文社科、大学生思想政治研究。

河——“温州模式”。所谓“温州模式”，是指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1]。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模式”与广东湛江的“吴川模式”齐名，“北有温州，南有吴川”的美誉在当时便名震全国，引起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此前关于“温州模式”发展历程的归纳主要是以发生时间为参考系，一般以10年为一个单位。这种划分方式简单明了，但是难以体现“温州模式”的发展状况。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本研究将“温州模式”视作一个兼具经济、社会、文化属性的“生命体”，根据其成长和发展的起伏状态和发展脉络，首创性地将其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四个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纵向、横向对比情况如表1，图1。

(一)“温州模式”发展探索期(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前，温州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三少

一差”：人均耕地少、国家补助少、可用资源少和交通条件差。1978年的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3.2亿元，排在杭州、宁波、嘉兴之后，位列浙江省第4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开启了温州的改革开放之路，农民们放下了锄头镰刀，拿起了算盘秤砣，一时间温州全民“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2]。1982年，温州掀起了第一次创业“小高潮”——温州地区个体工商户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当时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30万经销商从温州奔向全国各地推销“温州货”；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相继成立……温州农民就这样凭借他们智慧与勇敢迅速脱离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迈上了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从而形成了一个罕见的自下而上发展的区域经济体制，构筑出一个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截至1985年，温州约有60%的农民离开了耕地，转向办家庭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全市农村工业产

表1 “温州模式”纵向对比情况即温州市城镇-农村居民经济、人口对比情况

时间/年	全市生产总值/亿元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比情况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口对比情况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人口/万人	农村人口/万人	城镇化率/%
1978	13.2	—	113	55.98	505.28	9.97
1991	92.9	2 354	1 044	99.66	572.89	14.82
2003	1 212.5	16 035	5 548	142.95	599.33	19.26
2012	3 650.1	34 820	14 719	169.5	630.7	21.18
2018	6 006.2	56 097	27 478	925	647.5	70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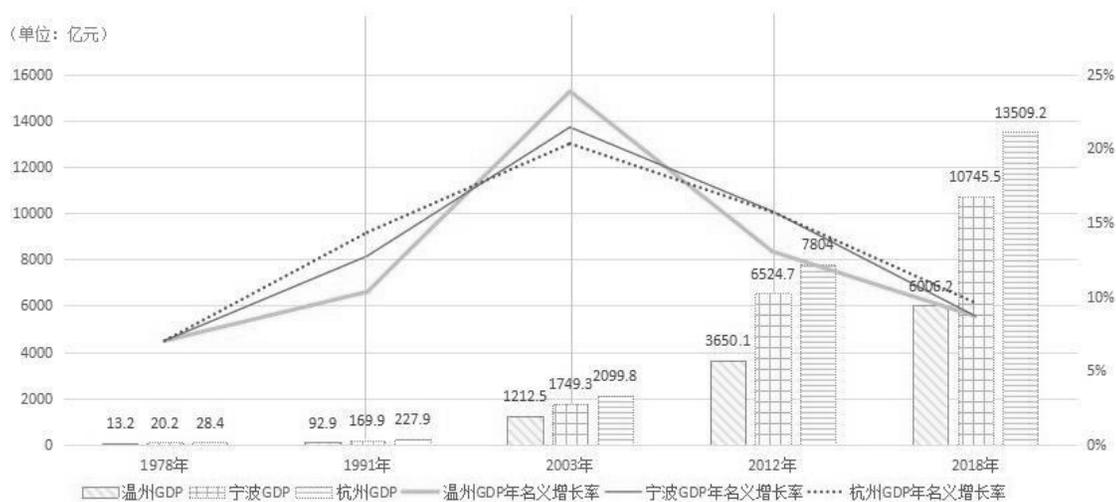


图1 “温州模式”横向对比情况即温、甬、杭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对比情况

值18.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其中家庭和联户工业13.3万个,产值11.4亿元,占工业产值的61.5%^[3]。

“温州模式”在获得初期的“小腾飞”后,也暴露出了“家庭作坊式经济”的巨大弊端——部分急功近利的温州人开始大量制造伪劣产品,一时间“温州货”成了假货的代名词。199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甚至罕见地单独为一个县城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家相关部门派出数百人来到温州乐清柳市,进行了将近半年的打假治劣整治,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被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4]。欺骗市场的结果是失去市场,1991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仅为92.9亿元,年增长率回落到10.31%,占全省比重甚至从1978年的10.67%下降到8.53%,远远落后于同期的杭州(年增长率和占全省比重分别为14.33%、20.92%)和宁波(年增长率和占全省比重分别为12.73%、15.60%),排名甚至被台州和绍兴反超,仅位列全省第5名,温州的改革发展在这几年经历了沉重的“阵痛期”。

(二)“温州模式”发展爆发期(1991—2003年)

在温州迎来改革发展“爆发期”之前,有关于“温州模式”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既给温州改革发展带来了困扰,也带来了机遇——1991年前后,中央曾派人三下温州,对此问题进行调查,所幸最终认定“温州模式”姓“社”不姓“资”,温州民营经济也因此卸下了一道无形的“枷锁”,可以彻底放手改革。

在经历长达十年的“放任式”管理后,温州市委、市政府也终于意识到必须通过加强市场调控、规范市场行为等手段来引导“温州模式”健康发展,于是在1994年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大会”,启动“二次创业”,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由政府制订的质量立市法规——《温州质量立市实施办法》,不惜付出上亿元损失的代价,重金、重拳治理区域性、行业性的产品质量问题,可以说这是一场触及温州商人灵魂的改革,从此温州迎来“温州模式”发展的第二春。

在上一阶段的80年代中后期,温州小城镇建设的迅猛发展也给这一时期“温州模式”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旺盛的初始市场化和初始工业化的强劲推动下,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后,温州的

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猛增到1991年的121个,人口达到26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8.7%^[5]。通过城镇化建设,区位优势 and 资源优势得以互补,涌现出诸如“中国农民第一城”苍南龙港镇、“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城”乐清柳市镇、“中国纽扣之都”永嘉桥头镇、“中国品牌第一镇”永嘉瓯北镇等经济强镇、名镇,温州农村工业化蓬勃发展。“温州模式”的实质是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具有机制灵活、产权明晰、风险自担等特点,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温州模式”闪耀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活跃和勃勃生机。在经历市场规范和质量整改的基础上,温州的专业市场进一步转型升级,在产业结构上以产业集群为核心,表现为精细的社会化分工和协作,根据乡村实际情况,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专业化生产特色,逐渐形成以低压电器、服装、鞋、打火机和眼镜五大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

“温州制造”至此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温州品牌”更是层出不穷,温州地区大多数大型民营企业如均瑶集团(1991年)、人本集团(1991年)、德力西集团(1991年)、青山控股(1992年)、红蜻蜓集团(1995年)、美特斯·邦威集团(1995年)、森马集团(1996年)、报喜鸟集团(1996年)、蜘蛛王鞋业(1996年)、人民电器(1996年)、奥康集团(1997年)、法派集团(1997年)、天正集团(1997年)、大自然钢业(2002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立或重组的,温州也因此一跃成为我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城市。这一时期是“温州模式”发展的爆发期,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69.2亿元一路高歌猛进增长到2003年的1212.5亿元,名义年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3.87%(超过同期的杭州20.33%和宁波21.44%),其中1993年达到峰值54.55%;占全省比重也从1991年的8.53%上升到2003年的12.49%,排名上升到全省第3名。这一时期温州人的生活殷实、富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比上海还要高出1000多元,汽车、电脑、钢琴等高档消费品的拥有量也远高于杭州和宁波^[6],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温州模式”风头一时无两,声震寰宇。

(三)“温州模式”发展瓶颈期(2003—2012年)

进入新世纪的温州,公司制企业已突破一万家,并拥有了“中国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眼镜之都”、“中国电器城”^[7]等十余张国家级名

片。然而“温州模式”在历经初期的摸索、前期小高潮和低谷以及中期的大爆发后，至此进入“慢车道”——经济总量稳定在省内第三，与“标兵”杭州、宁波的差距开始增大，与“追兵”绍兴、台州的距离开始缩小，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到2003年下半年甚至落至全省倒数第一。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州模式”靠千家万户的农民家庭作坊发迹壮大，也因此疲态尽显——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早已不再是一个物资匮乏的落后国家，社会和民众对于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价格不再是市场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温州遍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产品来说无疑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温州的打火机行业，在1992年鼎盛之际超过了3 000多家公司，而到了2008年仅剩下100多家，“温州模式”粗放发展的局限性在进入千禧年后开始慢慢显现出来。然而这一次，站在历史性转折口的“温州模式”并没能再次抓住机遇，在大多数民营企业不具备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开始出现连年亏损，纷纷倒闭。政府的“无为而治”导致温州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杭州、宁波等兄弟城市，再加上土地资源匮乏、交通条件不佳等资源禀赋的先天弱势，不仅没能筑巢引凤，许多优质企业如飞科电器、奔腾电器、水星家纺、美特斯·邦威甚至迁离温州，让这一时期本就举步维艰的“温州模式”雪上加霜。

是幸运也是不幸，当干实业已经没有多少利润空间时，具有经济头脑而又擅耍“小聪明”的温州人又摸索到了另一通“门道”——投机生意。前期的“温州模式”已经让温州民间积累了雄厚的财富，投机生意正好可以发挥这部分闲置财富的用途，以最负盛名的“温州炒房团”为例，仅在2005年前后，就有超过2 000亿元的温州民间资金投入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其中北京、上海两大城市便集中了1 000亿元。“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房价狂飙，一时间“温州炒房团”广为人知，备受关注与非议。这种带有投机性质的“炒作”再次让温州人赚得盆丰钵满，于是不少人纷纷将主业搁置一边，炒房、炒股、炒煤、炒矿的行当开始盛行，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干”不如“炒”似乎已经成了人们新的共识，以实业发家的“温州模式”开始慢慢变形、变味。

然而投机终究不是长久买卖，在经历“癫狂式”的短暂巅峰后，“温州炒团”相继开始覆灭——2009年3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8]，一纸公文让在晋温商500多亿元的煤矿投资一夜蒸发；2010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以及央行的连续加息使得温州房价大幅下跌，如香缇半岛、中梁府等楼盘从每平方米6~7万元直接跌到3万元左右……据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超过了3 000亿元，利息大多在15%以上，地区不良贷款率达到了惊人的5%。实体经济的衰败让温州民间资金链异常脆弱，一旦断裂便会产生不良的连锁反应，由于炒房、炒煤失败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温州不少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仅2011年9月22日一天就出现9位企业老板负债出走^[9]，那首著名的调侃歌曲《江南皮革厂》正是对这一时期温州经济社会状况的生动描述和有力嘲讽，民间借贷危机成为压死温州“炒团”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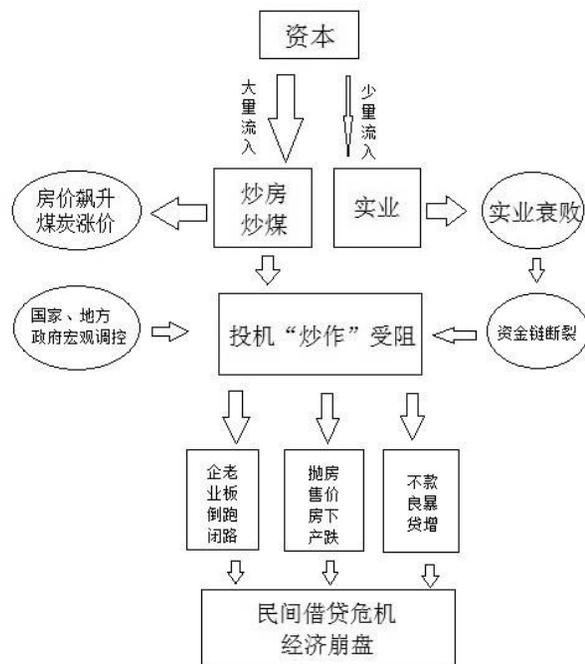


图2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成因流程图

温州“炒团”吸走了温州民间、银行、企业几乎所有的流动资本，许多温州企业错过了实体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机，如今“投机炒作”受阻，温州人才终于明白实业经济才是资本源源不断的来源，可是温州的实业发展已经停滞多年，“温州模式”正经历着一段难捱的瓶颈期。

(四)“温州模式”发展恢复期(2012年至今)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温州经济开始慢慢走出“炒房炒煤团”和“民间借贷危机”的阴影,然而作为典型的传统制造业城市,温州的民营经济增长依旧乏力。在国家政策支持和“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专业分工和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富有敏锐商业嗅觉的温州人和以草根经济为基础的“温州模式”再次迎来了绝佳的恢复时机——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在温州市设立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引导、规范温州民间融资发展。这是国家给予温州的一大支持政策,开启温州率全国之先的金融综合改革之路。

2013年以来,温州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先后设立3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1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合作区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入驻中国企业228家,年产值达22亿美元,带动出口8.8亿美元,成为拥有最多国家级境外园区的地级市。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38万温州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9],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在“一带一路”上继续创造着新的“温州模式”。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这无疑与“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的“温州精神”一拍即合。为了充分激活“温州模式”,温州市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实施意见》、《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政策全力支持,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让温州民众的创业热情高涨,一时间创业学院、创业园区、众创空间层出不穷,大有改革开放初期之势。根据温州市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温州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来看,2018年年末温州共有各类在册市场主体96.9万户,可以说在温州大概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1人是老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瓯越大地蔚然成风,成为“温州模式”全新的发展态势。

二、“温州模式”的价值思考

遵循“温州模式”的形成历史、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温州模式”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

重要代表作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价值:“温州模式”是我国民营经济的生动样本

“温州模式”首先是个经济名词,它的首要价值就是经济价值。“温州模式”的本质是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各地人民因地制宜,大胆进行市场改革尝试,走出多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道路,尤以“温州模式”、“吴川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四大模式最为著名(见表2)。而与其他三大模式相比,“温州模式”虽然一直饱受争议,也曾历经低谷,但“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却是最为开拓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种模式,它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可以说是最纯粹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以致于“温州模式”一度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温州模式”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三条主线:小商品—专业市场—市场网络、特色产业—块状经济—强镇重镇、从温州人—温州精神—温州企业家,这三条主线形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三大优势,即经营的优势、块状经济的优势和企业家群体的优势。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能够实现由贫穷到总体小康的跨越提升,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经济是推动温州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目前,温州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高于浙江和全国15%和30%,民营企业数量、工业产值、上缴税收、外贸出口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全市的99.5%、95.5%、80%、90%和93%,全市拥有民营企业20多万家,10家温企入围“2017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见表3),温州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的建设更是将温州的民营经济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温州模式”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温州模式”在不断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民办、民营、民有、民享、民富”的鲜明特色,成为我国民营经济最为生动的样本和经验。

(二)政治价值:“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温州模式”的第二个价值是政治价值。“温州模式”的精髓是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表2 我国四大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对比情况

经济模式	地区	特点	现状
温州模式	浙江温州地区	以市场和民营企业为主导，通过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2018年温州市GDP为6 006亿元，位列浙江省第3，全国第35；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温州地区的乐清、瑞安常年位列全国前50。“温州模式”历经辉煌和低谷，正处于恢复期。
吴川模式	广东湛江地区	个体、私营、联营、股份合作等经济形式并驾齐驱，形成“镇办、村办、个体办、联户办”的发展格局。	2018年湛江市GDP为3 012亿元，位列广东省第8，全国第81；2018年吴川市GDP为282亿元，在湛江市各县（市）区仅排第8，与全国县域强市（县）差距明显。“吴川模式”已经没落多年。
苏南模式	江苏苏南地区	农民在乡镇政府主导下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	2018年苏南地区各城市GDP分别为：苏州18 597亿元（全国第7）、无锡11 438亿元（全国第14）、常州7 050亿元（全国第29）；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宜兴常年位居全国前10。“苏南模式”蓬勃发展。
晋江模式	福建泉州地区	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	2018年泉州市GDP为8 467亿元，位列福建省第1，全国第19；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晋江常年位列全国前10，泉州地区的石狮、南安、惠安也都常年位列全国百强。“晋江模式”发展水平较高。

数据来源：根据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整理而成

表3 入围“2017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温企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销售总额/亿元	“百强”排名	企业简介
1	青山控股	1 615.88	3	成立于1992年，主业为不锈钢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包括对外投资、制造、销售、仓储、进出口业务，不锈钢粗钢产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正泰集团	601.77	19	始创于1984年，起步于低压电器产业，主业覆盖电力设备全产业链，是亚洲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企业。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3	德力西集团	525.89	20	成立于1991年，以生产高中低压电器、输配电电气和工业自动化控股电器为主，助力“神舟”、“嫦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
4	人民电器	403.40	24	成立于1996年，以智慧电网为产业核心，横跨产业新城、新能源、微波通讯、电商平台等八大产业集群，是我国工业电器领域价值第一品牌。
5	华峰集团	322.64	33	始创于1991年，以新材料为主业，业务涉及房地产、物流、金融等，是我国最大的聚氨酯产品生产企业。
6	森马集团	261.28	37	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以虚拟经营为特色、以系列休闲服饰为主导产业的无区域集团。
7	华仪集团	221.54	50	始创于1996年，以高压电器为主业，业务涉及低压电器、风力发电、房地产、化工等行业。
8	奥康集团	195.30	56	成立于1997年，以制鞋为主业，涉足商业地产、生物制品、金融投资等领域。
9	人本集团	160.40	72	成立于1991年，主业涵盖轴承业、商业超市、机电贸易等，是我国最大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
10	致远控股	138.02	93	成立于1995年，主业包括对实业、房地产的投资以及机械加工销售、废旧金属回收、进出口贸易等。

数据来源：浙江省工商局、省工商联、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联合发布的《“2017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名单》

建立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温州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其身上必然打有深深的时代烙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可以说“温州模式”对于个体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市场的探索，

极大地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是非常契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的。

200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曾指出，温州的实践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正确，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正确。201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同志在温州考察时也表示，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发祥地，温州的改革发展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他们的话

充分证明了无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是全面深入改革的当下,“温州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温州模式”的形成历史也进一步告诉我们,“温州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探索,是四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伟大实践。

(三)文化价值:“温州模式”是温州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温州模式”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是显性的,是被许多学者多次研究和论证的,而其文化价值往往被忽视。其实,“温州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一大优势是温州文化和温州精神。所谓温州文化,是指在由永嘉文化、海洋文化、乡村文化等结合而成的具有温州特性的综合性地域文化,它既蕴含了永嘉文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又兼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放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既敢为人先、勇于闯荡又有着浓厚的家族意识和人情意识^[12]。所谓温州精神,是指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和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13]。

经济模式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模式,任何经济模式都是在文化中存在与发展的^[14],文化和精神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的,“温州模式”也不例外。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温州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决

定了温州的人文精神,形成了以永嘉文化、海洋文化、乡村文化为主线的文化形态和以“创业、自主、开拓、创造”为核心的精神风貌,这样的人文精神对温州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是“温州模式”诞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源。可以说“温州模式”正是在温州文化与温州精神的涵养和孕育中形成的,同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温州模式”又不断丰富着温州文化与温州精神的内涵,“温州模式”与温州文化、温州精神密不可分。

2012年,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李强同志在世界温州人大会上指出,温州要充分发挥温州人的优势,弘扬温州人精神。2017年,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的周江勇同志也曾分别从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温州文化的自信和自醒、文化视角下“温州模式”再出发等三个层面来阐述“温州模式”和温州的人文精神的关系。2018年,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也再次强调,要不断丰富“温州模式”的新内涵,就要挖掘弘扬温州优秀文化,大力推进文化温州建设。他们的话充分说明了温州文化和温州精神对于“温州模式”发展的重要性,“温州模式”的内在逻辑也进一步告诉我们,温州文化和温州精神是广大的温州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是“温州模式”区别于其他经济社会模式的优势所在。

参考文献:

- [1] 黄成涛.任新年.种下知识产权的“种子”[J].辅导员,2011(16):43.
- [2] 方立明,奚从清.温州模式:内涵、特征与价值[J].浙江大学学报,2005(3):175.
- [3] 欧阳德.“温州模式”的启示[J].商讯(公司金融),1987(1):20.
- [4] 刘洋.温州:打造民营经济“升级版”[N].开封日报,2014-4-30.
- [5] 易千枫,徐强,项志远.改革开放30年温州城镇化发展回顾与思考[J].城市规划,2009(11):18.
- [6] 王华兵.温州模式:现状、成因、前景及其启示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5(11):255.
- [7] 胡剑谨.续写创新史:温州改革开放40年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53.
- [8] 张明喜,魏世杰,蒋琇.民间资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问题研究[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11(10):23.
- [9] 黄越.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及治理对策——以温州民间借贷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2.
- [10] 叶凝碧.融入“一带一路”看温州如何成为“世界的温州”[N].温州日报,2017-7-17.
- [11] 陈征,刘馨宇.改革开放背景下宪法对营业自由的保护[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23.
- [12] 高文君.论温州文化对温州模式的影响[J].商,2015(30):88.
- [13] 孙明霞.从“温州精神”看温州教育[J].当代教育科学,2006(18):34.
- [14] 张苗荧.温州文化、温州精神与温州模式的超越[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3.

(责任编辑:叶锋)